

處境探討

香港社會企業運動的神學反省

紀治興

(豐盛社企學會主席)

1) 引言

香港政府自二零零六年開始推動社會企業（社企），幫助弱勢社群，紓緩貧窮。本文嘗試討論當下香港基督徒可以考慮的一種「忠於信仰，福於眾人」¹的典範。透過社企幫助弱勢群體，彰顯社會良知。讓傾向私人化的基督教，擺脫聖俗二分的迷思，肯定和回復其迷失了四百多年²基督信仰的公共性；正如龔立人³所倡議的公共神學，即「按公共理性原則表達基督教的價值和觀點，努力爭取在教會以外的社會空間發言和發揮其影響力，以建立一個美好的社會。」而這影響力是建基於樂意接受批判的論述，透過不斷改良的實踐，尋求社會改變的可能性。

社企是一種實踐，從基督信仰作出的反思，可說是實踐的神學反省。李奧納多·柏夫⁴提出「一種做神學的方法，建基於知識，在最嚴謹的反省中發展出來。它有助分辨意義，亦對改變社會有所貢獻。因此，它的產生及發展，並

¹ 《時代論壇》在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二日的社論

² Cobb, B. John (1993), *Becoming a Thinking Christian: If We Want Church Renewal, We Will Have to Renew Thinking in the Church*,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Page 99-100. "If we study the history of theology, we cannot help being struck by the way its range of topics has narrowed. For early church leaders, such as St. Augustine and St. Thomas Aquinas, no topic is excluded. They assume that there is a Christian way of viewing everything... The Protestant reformers Luther and Calvin continued this tradition."

³ 羅永生、龔立人主編 (2010)，《宗教右派》，香港：香港基督徒學會，55 頁

⁴ Boff, Leonard, and Boff, Clodovis (1987), *Introducing Liberation Theology*. (translated by Paul Burns), New York: Orbis. P.24-42

不是孕育於過去的文字或做法，卻是孕育於當下的實況及將來的可能性⁵。」他所提出的四個步驟，也是本文的結構。

- 親身參與的經驗 這是一種行動研究 (Action Research)，也是實踐神學的基本步。在實踐過程中，現實的議題會與相關的實用性學科如工商管理等對話，從實踐經驗中總結出關鍵元素，在下一次的實踐中應用，有的放矢。
- 社會分析性默想 對話的學科是社會學，這也是尋求社會改變的解放神學中「解放」二字的精義。社會分析性默想是負責理解社會的結構性問題的步驟，從而找出改變的可能性。
- 詮釋性默想 對話的是基督信仰傳統。沒有這一步，這也不是神學反省。其中的默想可能是價值觀或世界觀的導引，也可能是待人處事對大地方面的啟發。
- 實踐性默想 這是總結上面三個步驟後，對進一步實踐的默想；以尋求美好的社會為目的，由點至面，在公共空間爭取話語權及影響力，推敲出一種改變的可能性；故此公共神學、市場通訊、及公共行政是其對話的學科。

本文是基於親身參與社企的經驗及反省而寫成。由對一間社企的反思出發，到後來以公共神學的理念推廣整個社企運動，前後共五年。現實中的思考步驟其實不是順序的，參與不久便以跨學科⁶的角度討思考其論述及實踐，發覺社企可建構為「意義」經濟，而背後的分享文化在聖經早有脈絡，最後以「社會學想像力⁷」的進路將社企運動在香港貧窮問題中的角色定位，然後再回到實踐性默想；過程摸著石頭過河，可說是如假包換的「做」神學。

⁵ Bevans, B. Stephen (2002), *Models of Contextual Theology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 New York: Orbis Books. P.70

⁶ 包括工商管理中品質管理及市場推廣、社會科學中社會資本、教育學中轉化式學習等

⁷ Mills, C. Wright (1959),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 社會企業的概況

廣義來說，社會企業⁸是一個同時擁有社會使命及商業使命的機構；創造社會價值是目標，而創造經濟價值則是先決的生存條件，因為機構惟有至少達成收支平衡，才能夠長期持續生存。社會企業既抱著百份百的社會使命，卻也是百份百的營商企業；當一位獲得更生機會的青少年到髮廊⁹當學徒時，他既是在重建自己的人生及尊嚴，也是為髮廊賺錢。同樣地，髮廊也是一邊在履行社會使命，一邊又履行著商業使命。這兩種情況，都正如基督既擁有百份百的神性，亦有百份百的人性。基督為了救人而道成肉身；而社企則是透過「下海」營商，幫助弱勢社群。

根據香港社會企業總會¹⁰在二零一零年三月的調查報告，在香港超過 93%的社企是非牟利機構¹¹。這些機構透過商業的活動去實踐社會使命，然後將所得的盈餘再投放在機構，用作社會服務或發展上。傳統的非牟利機構，要依賴政府資助或私人捐款才可以生存；但成功的社企卻致力營商以賺取盈利，先自助後助人，故這種社會服務並不持續耗掉政府資助或私人捐款，以致這些金錢可用於幫助其他新成立的社企。除了能減輕政府的財政負擔，與傳統的非營利機構比較，社企還有另一重大好處，就是透過提供工作機會，能夠激發受助者自力更生，重建他們的自我形象，幫助他們累積社會資本，賺回尊嚴和自信、亦能獲得社工或宗教團體，甚至其家人及大眾的接納。工作亦提供一種成長的經驗，在知識技能、人際關係、自我認識等範疇邁向成熟。

⁸ 社企的簡介，載於維基百科網址：http://en.wikipedia.org/wiki/Social_enterprise，2007年10月31日。美國所用的定義有少許分別：「當業務運作帶有一明顯的目的，就是產生社會價值，那業務便進入了社會企業的範疇。」此定義出自 Social Enterprise Knowledge Network (2006)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Social Enterprises: Lessons from Business and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 in Iberomeria*. Harvard University. P3.

⁹ 豐盛髮廊是本着僱用更生的青少年為學徒，幫助他們學習一技之長，重投社會。

¹⁰ 香港社會企業總會，http://www.sechamber.hk/en_introduction.php

¹¹ NGO 即非政府機構，或非營利機構（NPO），或第三部門亦是同類型的機構。

社會企業一詞始於一九七八年，根據英國社會企業聯盟¹²在二零一零年二月的宣言，英國社企營業額達 240 億鎊，等於 2,834 億港元。是國民生產總值的 1.6%；更重要的是這股社企趨勢已銳不可擋。五年前，政府以「夥伴倡自強」基金推動社企，現時香港有大約 330 家社企，營業額約 3 億港元，是國民生產總值的 0.02%，以此計算英國社企對國民生產總值的貢獻是香港的九十倍，可以說社企在香港的發展空間可以很大。現時的 330 間社企共僱用全職或兼職約 5,000 人¹³，佔勞動人口 0.14%。為有工作能力而沒有競爭力的弱勢社群提供就業機會。假如香港能追及英國的社企滲透率，在就業方面，受惠人士將會大增。香港大部分的社企正處於起步階段，屬中小型企業，在二零零八年只有 27%¹⁴有盈利，72%¹⁵的社企希望有「知識型義工」參與營運，改善產品的質素及推銷。社企面臨最大的內在挑戰，就是要改良產品的質素。根據豐盛的調查報告，以 5 分為滿分，本港社企產品的平均滿意度是 3.6 分，可說是合格但沒有商業競爭力。現時大眾對社企的價值的瞭解及支持仍然有限。以逆向的角度看，社企運動潛力大但有待拓展。

¹² Social Enterprise Coalition, *No More Business as Usual: A Social Enterprise Manifesto*, February 2010

¹³ 香港社會企業總會 2010 年 3 月的調查報告

¹⁴ 香港社會企業總會 2010 年 3 月的調查報告

¹⁵ 同上

3) 神學反省的框架：跨學科對話

3.1) 參與經驗：基督教豐盛職業訓練中心

在自然科學的領域，一般是根據觀察而發展出理論，然後是應用實踐；但在社會科學，尤其是教育及工商管理等實用性學科，更多情況是在日常的實踐中總結出理論，然後再去是應用和實踐。後者可說是一種行動研究 (Action Research) 雛形，其目的不是尋找新知識，而是改良現行的方法¹⁶。它的結論不是一種更正確主張，而是一些更好或另闢蹊徑的方法或手段。雖然只是一個個案的經驗，未必能普遍化；但它總能對其他實踐或多或少有所啟發。

3.1.1 豐盛關懷的社會議題

一九八七年，一群基督徒為了實踐神給教會的使命，創立了基督教豐盛職業訓練中心¹⁷，宗旨為「藉基督信仰，以企業營運，助更生少年，重投社會。」機構的願景是幫助曾經犯輕微罪行或吸毒的少年人，透過職業訓練及基督信仰，讓他們能夠重新融入正常的生活。現時豐盛營運一間車房、三間髮廊，每年營業額約九百萬元，能夠自負盈虧，員工四十人，其中一半是學徒，後者主要是釋囚及濫藥青少年。

若從經濟角度出發，罪案亦為社會帶來不少負擔。以二零零六年至零七年度為例，政府的數據顯示香港有 81,125 宗刑事舉報，當中 42,000 人被檢控，22,000 人被判監。可能不是太多人會意識到，原來為了這四萬多被檢控和監禁的人，政府每年竟需花上一百零七億元，其中包括警隊預算防止罪案發生及拘捕疑犯的七十七億元、律政署處理刑事檢控的四億、懲教署囚禁與管理犯人的廿四億，社會福利署為犯人提供支援的二億。也就是

¹⁶ Pring, Richard (2000), *Philosophy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London: continuum, p.133

¹⁷ 基督教豐盛社會企業, <http://www.fullness-salon.hk/>。亦可參考及 香港電臺 (2009), *鏗鏘集《營商要有道》*, 2009-3-16

說平均每年要在被檢控人士身上花費二十五萬元。這些統計讓我們知道，原來罪案問題，也會直接影響庫房開支。

3.1.2 豐盛的變更理論

豐盛的變更理論 (Theory Of Change) 是藉職業訓練讓邊青透過年多¹⁸至三年半的學徒生活重建自我形象及學曉一門將來可以賺取超越貧窮綫的收入。豐盛從懲教署或戒毒中心接收更生的青少年，首先會給他們灌輸正面的信念，包括只要肯努力，未來可譜出美麗人生，讓他們看到人生可以有盼望，藉此引發他們積極性；然後安排他們加入豐盛當學徒，一邊受訓一邊工作。除了知識和技能上的傳遞，更重視他們的生活紀律、學習態度、工作態度、情緒掌控、主動性及人際關係等。工作時間以外，髮型師亦會兼任生命導師之角色，和他們分享分擔生活上的喜怒哀樂，一起同行；而髮廊團契則可以讓他們接觸到基督信仰，引領他們尋找生命的真正安息處與力量來源。讓他們能夠在被支持的環境中工作，體驗到被尊重和關心¹⁹。

¹⁸ 髮廊學徒需要年半、車房學徒需要三年半。

¹⁹ 學徒的故事可參考亞洲電視 (2009), *社區人和事*, 《豐盛髮廊》, 2009-07-31

3.1.3 豐盛個案所揭示社企營商關鍵

豐盛的營商經驗，已總結成為《營商能耐可以改變社會》²⁰一書以讓其他社企參考；另外豐盛及友好社企的個案，亦收集於《社企營商二十式》²¹。社企要能自負盈虧必須找出及發揮其獨特的競爭優勢。社企的社會及商業雙重使命，很多人視之為兩難，帶來加倍的難度；但雙重使命其實也提供創新²²空間，帶來五種獨特資源優勢，是與其競爭的中小企所沒有的；若果運用得宜，社企的營運可以大幅改善。簡述如下：

- 知識型義工：在二零一零年六月發佈的香港知識型義工調查²³顯示，其中的豐盛義工覺得他們的服務對社企的價值是 4.8 分（以 5 分為滿分），而他們自己的滿意度是 4.4 分；這是一種雙贏。愈來愈多專業人士尋找機會，將知識技能回饋社會。他們有些已退休或半退休，因此都是有能力和有時間的。幫助社企對他們來說是比單單探望弱勢社群如無家者或釋囚更吸引的事情，因為他們能運用所學所長的專業知識，令社會更美好。根據政府統計處的資料，香港每年約六千名月入在四萬至十萬間的人士退休；他們不會個個都是管理專才，但以相對現時三百社企這是很大的人力資源。另外，追求理想社會的青年，社企亦成為他們的選項。
- 責任消費者：百分之二十三客人光顧豐盛的原因包含支持其社會使命的成份，責任消費佔其營業額的百分之十二。在二零一零年五月發佈的香港責任消費調查²⁴顯示百分之七十的公眾對社企的瞭解不足，因此對社企的支持較環保產品

²⁰紀治興、鄭敏華 (2008), 《營商能耐可以改變社會》, 香港: 思網絡

²¹紀治興、楊建霞 (2010), 《社企營商二十式》, 香港: 民政事務局 思網絡

²² Hampden-Turner, Charles, and Trompenaars, Fons (2000), *Building Cross-Cultural Competence: How to Create Wealth from Conflicting Values*,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²³ 基督教豐盛社會企業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十三日份發表的知識義工調查，詳情可參考翌日的報導，包括新報、東方日報、太陽日報、成報、經濟日報、文匯報、am730、頭條新聞。

²⁴ 香港海港青年商會於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三日份發表的責任消費調查，詳情可參考翌日的報導，包括新報、明報、星島日報、大公報日報、文匯報、蘋果、成報。

低。但明白了社企的理念後，消費者願意多三倍的購買社企產品、多付約百分之十七至二十一²⁵以支持其社會使命。

- 社會投資者：豐盛共有十七名投資者²⁶。香港現正興起一批從事金融業務的專業人士、及管理家族慈善基金的富豪第二代，他們正在尋求更有效地運用資金去改善社會，看重的是綜合的社會投資回報，最理想的是社會效益及財務上都有正回報，其次是在能夠在營運上自負盈虧的情況下有社會效益，最後是在相同的資金投放下能產出較傳統社福手段更大的社會效益。
- 商業夥伴：護髮用品公司 Schwarzkopf 的廣告在二零零九年以豐盛髮廊及髮型師推介其產品；這是一種社企與商企的雙贏安排。現時愈來愈多商業機構，夥伴社企以履行其企業社責任；例如煤氣公司與東華三院合作的煮饅易、和海皇粥麵與善導會的有稷計劃。
- 大眾媒體：豐盛在二零零九年共有二十四次媒體報導，包括三次電視一次電台。社企需要媒體去免費推廣產品及服務；另一方面，媒體亦需要社企自助及助人的故事以餉讀者或觀眾。

3.1.4 豐盛個案所體驗的雙贏關係

知識型義工及責任消費者參與社企的途徑，不是透過「捐錢」，而是捐「才」及「花」錢，即而是捐出才幹及花錢消費，這其中有三重意義。首先，這是讓受助者藉著工作，賺取薪酬和尊嚴，及在工作的環境中成長，是一種更有效的幫助。

另外，這也是知識型義工及責任消費者成長的機會。透過親身接觸前綫的員工或學徒；一方面他們能鼓勵前綫人員，另一方面他們也從前綫人員身上學習。盧雲神父

²⁵ 香港海港青年商會的責任消費調查。

²⁶ 豐盛的投資者關志康的故事，刊登於南華早報《Helping teens pays – in a way the stock market does not》by Agnes lam、《Investors put more money into social enterprises》by Agnes Lam, Martin Wong and Kobi Chan, 2009-11-02

²⁷教導我們，對邊緣人士真誠的同情，是先去聽，後行動；先學習，後幫助。後者是走出自我中心的觀點，自我中心會防礙我們發現自我及透過邊緣人士的生命看到神的作工。同在的事工²⁸就是與有需要的人在一起，這是一種深入的人與人連結。這對基督徒商人尤其重要，因為他們只慣於處理龐大的財務數字；但同在或與有需要的人「在一起」，將有助他們發現人的靈魂比有多少個零位的財務數字更重要。同在更是一種在貧乏者身上，找尋受苦的基督的操練。

最後，社會企業可以給基督徒商人一個合適的事奉上帝的出路。香港有很多中年的商業專才，他們都希望能運用專業知識及才幹貢獻社會及教會。但由於商業技巧經常被標籤為「屬世」，所以很受中年的中產基督徒都未能運用本身的專才在教會中服侍。社企是作為一個平台，讓知識型義工及責任消費者藉著服侍他人回應上帝給他們的恩賜及對他們的呼召。藉著社企的平台，讓上帝的愛揭示在人間。

支持者與社企的關係並不是施與受，而是雙方同時得益的局面。這是因為非零和的分享，不是我的「失」成為你的「得」；而是雙方所得回的，都比付出的多。

豐盛的經驗

豐盛經驗得出的結論是社企社會投資回報能較傳統社福手段更大，它有其獨特的營商優勢；而背後的支持者在參與過程中會有另類的意義作為其回報，這可以是一種多贏的關係。

周永新研究貧窮問題多年，他認為「授人以漁²⁹」不是解決貧窮的辦法；協助弱勢群體自食其力，看似合理但不易成功，因為受助者本身的條件有限。這也是香港很多社企還未成功的盲點。豐盛經驗指出社企不能單單教人釣魚，亦

²⁷ 溫偉耀。《無能者的大能--社會公義與屬靈操練》。基督徒卓越使團，1991。頁 30。

²⁸ 同上，頁 86。同在(Solidarity)的事工比策略和計劃更重要。

²⁹ 周永新 (2010), 〈低層市民生活二十年無改善〉, *信報*, 2010-09-30。

http://www.hkej.com/template/dnews/jsp/detail.jsp?dnews_id=2900&title_id=379663&txtSearch=%E5%91%A8%E6%B0%B8%E6%96%B0

要引魚到岸邊，而這些魚就是責任消費者；引魚的魚餌就是媒體報導；釣魚用具則有社會投資者提供；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作釣魚教練的知識型義工；而商界則可以在上述四方面與社企合作，成為社企的第五項資源。將這些資源引領到社企界，就不單是「授人以漁」，而是開發捕魚工業。

3.2) 社會分析性默想：社會學的想像

二零零九年十月，商業週刊給香港帶來了一個另類的「第一名」³⁰：在十一個富裕經濟體中，香港富人與窮人的差距是最大的。在香港，絕對貧窮的個案有存在但並不多見，而相對貧窮的問題卻很嚴重。貧富懸殊並不一定意味著官商在道德上的敗壞；即使每個人都出於好意，它們亦會出現。當下香港的相對貧窮問題是由經濟全球化現象引發出來。不公義和甚至結構性壓迫不一定是故意的。它們常常是隱含於社會流行的意識形態中。

3.2.1 經濟全球化帶來惡化的貧富懸殊、超速的轉變、力弱的政府

目前發展中國家在環球經濟體系中重新分配各自的角色。離岸製造和外包服務的業務量急劇增加，低土地和勞動力成本的國家和城市都在爭佔全球供應鏈的低中端市場。市場上有更多的競爭者，意味著那些不能在成本上競爭的，惟有在價值鏈中往上爬，否則便會被淘汰。例如，當越南和柬埔寨開放其經濟，加入全球供應鏈的遊戲，在中國沿海城市如廣東省惟有提升產業的檔次，調整其在全球市場的定位；讓出低端市場予其他內地中西部的城市與越南等國家競爭。這種跨國競爭的現象，在本土的勞動力市場同樣出現；在這個洗牌的遊戲中，隨著成本更低的國家出現，激烈的競爭令產品價格不斷受壓，工資亦被拖低。結果雖然整體經濟是向上，但無論國家之間和國家內部，貧富差距都是在擴大，勞動工人則以更低價出賣勞力。斯蒂格利茨³¹指出從一九九三年至二零零二年，世界總收入平均每年增加 2.5%；但同一時間，生活在貧困中的人卻增長了近十億人。事實上，貿易自由化導致更多人失業 - 就是為什麼它激起強烈反對。

除了貧富差距的問題外，全球化亦帶來超速的轉變、及力弱的政府。首先，經濟體系全球化的其中一個相關特點是進入全球市場的門檻大為降低，例如透過 eBay 每個人都可以做跨國買賣，一個在全球市場暢銷的產品如 iPad 可以迅速為製造商能帶來豐厚的收入和利潤；速度成為商業成功的一個關鍵因素，結果科技、商品、生

³⁰ 商業周刊 http://images.businessweek.com/ss/09/10/1013_biggest_rich_poor_gap_globally/28.htm

³¹ Stiglitz, E. Joseph (2003),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W. W. Norton & Company, P.5

活環境的轉變速度超過常人所能追趕或適應。在這個新的國家之間的分工中，低端市場是以成本競爭，高端市場是以知識競爭。在價值鏈中能否往上爬主要是取決於人力資本³²。所謂「知識」經濟，是指產品是以內涵的知識元素去競爭的經濟。「知識」的特點是別人很快便學曉；而且很快便出現新的知識。知識工人通過知識和技能賺取生活，但知識的半衰期一般只有幾年。為了保持在就業市場的競爭力，知識工人要不斷的自我提升，終身為工作學習；或加長工作時間，變相的資源增值。企業追求速度，個人被迫追求速度。個人學曉新知識的速度、個人適應社會轉變³³的速度、政府的官僚架構回應社會問題的速度等本身都成為問題；簡而言之，解決方案的出現遠遠落後於問題的出現。

另外，在全球化這大趨勢中，主要動力來自跨國大企業，它們透過將生產搬至最低成本的地方，將產品賣至最大的消費市場以獲取最大的利潤；當中除了美歐等少數國家能夠左右大局外，其餘的大多數國家只能被動地尋找應對之道。貧富懸殊持續擴大是全球的問題，這包括香港，問題更是日趨嚴重。香港政府沒有能力阻擋經濟全球化對本地的衝擊，也不想錯過整體財富增長的機會。如何在整體經濟增長和貧富懸殊擴大這兩難中尋出路，是香港政府的挑戰。

³² 信報月刊, 2009年12月, 32-38頁

³³ 例如國內經濟增長之快所需要的相關適應。

3.2.2 心靈上的貧乏

心靈上的貧乏比物質上的貧乏影響更大。最佳例子是不丹，這是一個經濟落後但曾獲選為全球最快樂的國家；菲律賓也是一個經常在快樂指數超越香港的地區。陸鴻基³⁴認為資本家及專業人士的世界觀及倫理觀構成了維繫著資本主義的支配性意識形態。市場本身有其紀律，主要是競爭。市場上人受到重視的角色主要就是企業家、生產者和消費者，各按經濟系統的機制參與經濟活動。然而，在生命中，我們也有很多非經濟的角色要擔當；那些角色對我們的生活、感情和抱負來說都非常重要。但每天工作時間無情的延伸、與及自我增值的壓力，放假則是為了到商場和娛樂場所消費，年中無休。市場至上的思維，籠罩人心，把人心既有的自私意念合理化；但同時也把只知私利的人孤立了起來，孳生了人們無能無助的疏離感。以下是一則故事³⁵可以作為說明：

「我曾經有幾次在醫管局分享社會企業，有一次會後一個顧問醫生上前來，告訴我他很欣賞社企的意念，也想參與，但他忙得連女兒也沒有時間關心，自己很內疚。我覺得他好像《誰挪動我的乳酪》一書中的老鼠，眼前形勢不妙，但卻不敢有所行動去改變，他就像坐在一所打開門的牢房中，覺得自己沒有可能離開；雖衣食無憂，但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亦不能令自己所愛的兒女開心，經年累月帶著一股『學習得來』的無力感去生活。」

這位五十個多歲的顧問醫生，他的職業生涯非常成功，但他既不能從事他覺得有意義的活動，他更為沒有時間陪伴家人而感到內疚，他大概也只有很少的時間從事自己的愛好和興趣。他有豐富的資產，但並沒有豐富的人生。

³⁴陸鴻基 (2009), 《心靈何價？資本主義全球化下的教育與心靈》，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

³⁵紀治興, *iQuest* 《社會企業家——你的名字是浪漫探險者》2010-10-11

http://www.iquest.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1891&Pid=1&Version=0&Cid=74&Charset=big5_hkscs

若果陸鴻基代表的是「基督抗拒商業文化」，葛霖³⁶代表的則是「基督溶於商業文化」。他認為基督徒要清楚知道自己是被召進入工作中，因為上帝希望每一個人在祂國度裡工作。上帝曾在一個階段呼召我們進入現時的事業，祂亦可能在另一階段呼召我們離開。在市場上自由競爭，絕不應把結果賦予生死攸關的終極價值。應看為遊戲，而非戰爭。最後，必須認清自己只是管家，在工作中所獲得的資源，並不真正屬於自己。雖然陸鴻基和葛霖對商業文化好像有不同的取態，但他們都表達工作並不是人生的一切。

生活可譬如為四個玻璃球，就是我們的工作成就、興趣愛好、家庭親友、及社會貢獻。兩隻手四個球，這意味著我們必須像一個雜技人在任何時間都只能握著一個或頂多兩個球在手中，其餘的要投擲到空中。雖然我們可能會專注更多的時間在其中一個球，我們仍然需要撥出一定數量的時間給其他三個球。否則這三個球將會從空中跌落到地上摔碎。我們不一定能重整破碎了的玻璃球，或另覓新球。在早期的職業生涯，大多數人的精力和時間都投放在追求事業的成功，提高的生活質量。然而，追求成就往往是在有意無意間犧牲其他三個玻璃球。上述的顧問醫生就是一個例子。他沒有時間從事他認為有意義的活動，沒有時間盡父母的責任陪伴孩子成長，他並不快樂；但他認為他不能改變現況、擁有更快樂的生活。他是活在別人的期望以及自己對自己的期望下，認為應該努力工作，尋求最大的成就，但單只是事業成就不能保證豐富的人生。有意義的人生，是讓別人開心，自己過癮。

³⁶ 葛霖 (2007)，《天國與財利—葛霖論金融市場》，Vocatio Creation Limited

3.2.3 相對貧窮問題

周永新指出：「全世界以資金帶動的經濟體制，沒有哪個的貧富差距不在惡化之中。上周有報道，美國的貧窮人口是半個世紀以來最多，差不多是整體人口的 15%，即七個人中有一個是窮人。」³⁷

香港的貧窮人口是 18%。香港家庭月入中位數是 17,250 元，貧窮線被定義為中位數的一半，即 8,625 元。香港大約有 22%的家庭共一百二十六萬人活在貧窮線之下，其中五十萬人需要靠綜援生活³⁸；在綜援網外的七十六萬人，主要是新移民及在職貧窮的家庭。然而，在那五十萬靠綜援維生的人當中，其實有二十萬人本身是有工作能力卻沒有競爭力的，他們欠的是機會，於是惟有依賴政府。經過計算後，只要剩下的 78%相對富裕的家庭願意拿出他們收入的 3%與貧窮人分享，那麼所有的貧困家庭都可以移到貧窮線之上。

在二零零九年特首曾蔭權在施政報告中說：「香港作為『城市經濟體』，要解決就業及貧窮問題，仍要依靠經濟增長，共同創富。若要維持以福利為主的紓困措施，必須大幅調整稅制，提高稅率，我相信市民不會認同這個做法。羣策羣力推動產業發展，才是治本之道。」但他沒有指出在施政報告中所推動的知識和創意產業是不會僱用這些低技術工人的。

表一：十年內政府的公共開支在福利的公範疇增加了兩個百分點

公共開支	教育	福利	醫療	房屋	合共
1999-00	21.3%	14.1%	14.6%	6.6%	56.6%
2009-10	22.3%	16.3%	14.8%	4.3%	57.7%

³⁷ 周永新 (2010), 〈低層市民生活二十年無改善〉, 信報, 2010-09-30, http://www.hkej.com/template/dnews/jsp/detail.jsp?dnews_id=2900&title_id=379663&txtSearch=%E5%91%A8%E6%B0%B8%E6%96%B0

³⁸ 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 <http://www.hkjp.org/focus.php?cid=4&topic=12&id=220>

其實需要羣策羣力推動的是施政報告中另外述說的社會企業。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史蒂列茲指出：「中小企是創造就業的基礎。」這是因為大部分中小企是勞力密集型，營業收入主要是用來支付薪金。香港很多社企都是中小企，創辦目的就是為了給這群低技術人士工作的機會；透過一些社企特有的優勢，讓沒有競爭力的工人組成有競爭力的業務，賺取薪金、尊嚴及社群關係。這些特有的優勢包括不求投資財務回報的社會創投基金、協助改善產品質素的知識義工、責任消費市場的需求、及媒體的免費報導及宣傳。香港人其實愛心不少，根據五月份發表的責任消費調查，受訪者願意多付 17%-21% 以支持社企的產品或服務，六月份發表的知識義工調查，受訪義工平均每週用 4.3 小時幫助社企，約相等於每週標準工作 40 小時的 10%。

特首曾蔭權在施政報告中說需要改革的，其實不是稅制，而是價值觀：我們作為公民是可以改變社會，解決貧窮。需為建構的是社會資本體系中的動員及配置機制：讓 78% 相對富裕的家庭能夠參與社企運動，成為知識義工或採購社企的產品或服務；將 3% 貧窮線上的資源送往貧窮線下的家庭。藉著稅收重新分配收入，可以改善窮人生活的問題；但過程中納稅人看不見受益人，也管不了其中政府系統的效能效率；社企提供一種另類的選項，過程中受持者能夠接觸到受益人；社企提供的工作亦不單改善他們的生活，亦讓他們重獲尊嚴及成長的機會。社會企業展示了一幅迥異的可能世界的圖像。

3.3) 詮釋性默想：另類價值觀

第一個世紀的耶穌運動示範了一條改變社會的第一步是改變想法。在「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太 4:17b）這句口號中耶穌首先提醒猶太人他們所追尋的人生理想、及這個理想不是遙不可及，但為此他們要悔改，亦即是要改變一直以來的想法，重整價值觀。從登山寶訓的八福開始，貫穿福音書大量篇幅都是關於另類價值觀。耶穌是以其破格的言行，顛覆當時的猶太文化。而啟示錄的內容，亦可看為是在顛覆當時的羅馬政權及文化。不單新約如此，舊約的先知如阿摩司和彌迦等，都是在批判當代文化，提出另類價值觀。他們在世而不滿足於世界的現況，倡議更高的公共靈性標準，盼望更美好的未來。

神關心那些受壓迫、邊緣化，及弱勢的群體。路加福音 4:18-19，耶穌說：「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香港所面對的是整體有足夠的財富，但個別家庭的情況差距太大。在扶貧的議題上，聖經的指引是「分享」。在馬太福音 25:40，耶穌重覆對弱勢人士的關注：「王要回答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作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這裡有兩點需要討論：第一，分享文化的基礎；其次，是誰分享的考慮。

3.3.1 「分享多餘」的文化

這裡要反思的有三點：聖經中「足夠」的概念、「剩餘」價值、及價值的「不對稱」性質。「嗎哪」（出 16:31）是展示「足夠」的概念的一個例子。上帝藉「嗎哪」讓以色列人學習知足，只要儲備足夠的份量就好了，適可而止，多留下的只會變臭腐爛（太 6:19-24）。反過來說，永不知足很容易變成貪得無厭，貪婪亦成為犯罪的種子。

「當這些恐懼感蠶食你心靈的時候，你唯一的結局就是貪婪地追逐-追逐你能力可以抓得到的一切。你對自己說：『萬一！萬一有意外的時候，我需要有足夠的應付能力啊！』於是你把四壁都堆滿，堆滿了屬於你每寸的空間。³⁹」

知足不一定是等於清教徒式的生活，正如傳道書 2:24 所說「人莫強如吃喝，且在勞碌中享福，我看這也是出於神的手。」享受勞碌所得不是罪。知足也不一定是等於要將所有財富放棄，黃根春在其《新約聖經財富觀的反思》中指出保羅接納富有者成為基督徒⁴⁰，並不一定要放棄所有。約翰衛斯理的名句「基督徒應該努力賺錢，和努力奉獻，幫助有需要的人。」是一種更積極回應上帝恩賜的態度，比爾蓋茨及沃倫巴非特都是衣食足知榮辱的典範。

當有了足夠的保障後，剩餘⁴¹下來的便可以運用於有意義的事情上。在路得記中，波阿斯示範了如何運用剩餘下來的麥穗，讓貧乏者透過多勞多得的機制獲得食物。波阿斯是大財主，吩咐僕人在收割之後讓窮人拾取麥穗；對個別更值得幫助者，「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麥穗也可以容他，不可羞辱他。並要從捆裡抽出些來，留在地下任他拾取，不可叱嚇他。」(路得記 2:15-16) 另一方面，路得也不是坐著等人救濟的，而是到田間撿拾麥穗。在帖撒羅尼迦後書 3:11-12，保羅期望人人都盡可能去工作：「因我們聽說，在你們中間有人不按規矩而行，甚麼工都不作，反倒專管閒事。我們靠主耶穌基督，吩咐勸戒這樣的人，要安靜作工，喫自己的飯。」弱勢社群若能得到像波阿斯般的富人幫助，就能生活得有尊嚴；而富裕人士亦能免受神的懲罰，這是雙贏的結果。

³⁹溫偉耀(1991)，《無能者的大能--社會公義與屬靈操練》。香港：基督徒卓越使團，33 頁

⁴⁰盧龍光、鄭炳釗、張修齊(2007)，*聖經的人生：馮蔭坤博士七十壽辰慶賀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162 頁

⁴¹在經濟學和會計學中，足夠與剩餘並沒有必然關係。剩餘是指一些可以產生價值但沒有產生價值的資源，結果是浪費。例子包括航機上空置的機位。

富者，是已有足夠；貧者，是有所不足。在知足者與不足者眼中，同一事物的相對價值不一樣。同樣的麥穗，它在波阿斯和路得眼中的價值並不對稱⁴²。對波阿斯來說麥穗是九牛一毛，但對路得麥穗是維生的食物。同樣的一天，葉忒羅可以休閒地弄孫為樂，也可以用來觀察摩西如何審理以色列民的案子，然後教他設計組織架構及審理流程。同一樣物品，對不同人可以有不同的價值。因為價值的不對稱，自己可能只是付出很小，但別人已覺得獲取很多，形成雙贏局面。

華理克說：「生命本來就是要分享的。⁴³」聖經所鼓勵的是分享文化而不是累積文化⁴⁴。追求事業成就是重要的，因為它不單止提供生活上的需要，而且也是培育一個人的主要途徑，包括獲取知識和發展人際關係。問題是那種「永不足夠」的慾望，令人無法抽身；貧乏的生活並不一定是因為擁有很少，而是希望擁有更多。惟有知所適止，我們才能夠過一種能有選擇的生活，成為自己的主人，亦即是時間表的主人。在工作成就上知所適止，就能將時間及精力分配到家庭親友、社會服務、及興趣愛好。陽光衛視的創辦人楊瀾分享道：「富，不是擁有很多，而是想到便可以做。」；她是在馬斯婁的自我實現層次。另外，運用多出來的時間、能力及財力，可以幫助有需要的人，對社會有所貢獻。「衣食足、知榮辱」的中國傳統盛世文化價值觀可以說是馬斯婁五層需要的簡化兩層版本。台中市長胡志強總結出：「真正有意義的人生，就是要讓別人開心、自己過癮。」分享文化勝過關懷文化。後者可以止於表態而沒有前者的積極行動。

3.3.2 分享是所有人的責任

分享是富人及窮人的責任。富人要明白「行公義好憐憫」是上帝要求的責任；而窮人要明白他們也同樣要扶助其他人。一個對上帝有真誠信仰的人，是必然的懂得用託管的態度去看待自己所擁有的財富。嚮往追尋超於物慾的高層次滿足感、以整

⁴² 價值不對稱是交易的基礎。

⁴³ 華理克(2003)，《標竿人生》，台北：道聲出版社，154 頁

⁴⁴ 郭鴻標及堵建偉(2002)，《新世紀的神學議程，下冊》。香港：香港基督徒學會，358 頁

體社會作為終極性的視野去運用私有財富、願意為他人作出犧牲的情操⁴⁵。華理克說：「真正的團契不只是參加聚會，亦是一起經歷生命，這包括無私互愛、真誠分享、實踐服事、犧牲的付出、同情安慰，以及所有新約聖經中有關『彼此』的命令。⁴⁶」

神關注所有人，尤其是貧窮人的公平和公義；「惟願公平如大水滾滾、使公義如江河滔滔。」但這公平和公義需要人的合作，因為當人阻擋公平，而神又未有介入，那人便造成了不公平和不公義。在阿摩司的時代，藉著政治和經濟的優勢，當權者和富裕人士享有豐盛物質和財富，以致在弱勢人士身上犯罪，這是受神所譴責的。以色列的富人認為他們的富足是神的祝福；雖然阿摩司作出警告，但他們卻充耳不聞。而阿瑪謝祭司亦認可他們這種看法。其實，神對他們發怒，後來將整個國家毀滅。這群富裕人士中，某些人被嚴懲是因為個人明顯的罪，另一些人則因為無視其在結構性罪中的角色。阿摩司書 5:18-27 記載有關耶和華對以色列將來的公義審判。就是「更多的工作落在阿摩司身上，公平和公義是為了百姓的好處，但這好處的代價是犧牲社會的穩定⁴⁷。」以色列將要面對災難，那是耶和華為了行公平和公義而作的。結果是令人震驚的，與挪亞故事的洪水相似。弱勢人士將目睹社會性的破壞，看到耶和華的公平和公義。貧窮人在社會制度的瓦解中只有些微損失，他們感到歡喜，因為上等階層末落，以致他們不再受壓迫，可以自由地在世生活。

富有並不是罪，亞伯拉罕和約伯都是富有的人，但直接壓迫人，以及被動地參與剝削受壓迫和弱勢群體的政治和經濟體系，那便是罪。神愛貧窮的人，

⁴⁵ 溫偉耀 (2009)，《生命的轉化與超拔：我的基轉宗教漢語神學思考》，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⁴⁶ 華理克 (2003)，《標竿人生》，台北：道聲出版社，154 頁

⁴⁷ Jon L. Berquist 的有關論點載於『Dangerous Waters of Justice and Righteousness: Amos 5:18-27』一文中，這出自 *Biblical Studies Alternatively: An Introductory Reader*, New Jersey: Upper Saddle River, edited by Scholz, Susanne (2003). P.339

並不代表神不愛富有的人。但行公義好憐憫是所有人的責任而不是選項。以為「好憐憫」是選項，是輕看神的要求。

然而，幫助有需要的人是所有人的責任，窮人並沒有豁免，同樣有責任。只是付出多少及形式有不一樣的考慮。在馬太福音 24 至 25 章的「忠心和不忠人的僕人」、「十個童女」、和「才幹」等比喻都在顯示為奴為婢的也要負責任。在 25 章末的大審判中，耶穌指出要給餓的吃、渴的喝、赤身露體的穿、病的看顧。所付出的可能只是「一杯涼水」(太 10:42)，也可得到賞賜。幫助有需要的人是大審判中分別是往永刑與抑或是往永生的一個標準。總括而言，扶助弱小，不單是政府和富人的責任，也是窮人的責任，亦即是所有人的責任。此外，這是責任而不是選項。並不是做了有獎賞，不做也無所謂，而是大審判的一個標準。行公義好憐憫是富人及窮人的責任。

說來有點諷刺，是富人應該向窮人學習分享。二零一零年七月三十一日《經濟學人》⁴⁸刊登一篇加州大學的研究結果，指出窮人和富人在慈惠及分享上的取向有明顯分別。窮人認為應該捐出 5.6% 收入作慈善，而富人則是 2.1%。在另一個實驗中，窮人總是願意幫助有需要的人，而富人則需要別人提醒才會伸出援手。在需要與陌生人分享意外之財時，窮人平均願意分出 48%，而富人則是 34%。二零一零年五月香港海港青年商會的责任消費調查中，月入二萬元以下的人較月入更多的人願意付較高的價錢購買社企的產品。這種窮人彰顯更多慷慨及關懷他人的現象，可能來自窮人明白他們需要互信互助去共度困難。其實這種草根階層互信互助的現象，在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很普遍。很多住在公共屋邨的家庭，在節期都會準備多一點應節食品分予隔鄰較缺乏的家庭；遇到有老弱或病患，則會幫忙家務或照顧孩童。電影「唐山大地震」其中失去丈夫、女兒的主角有一句話是「『沒有』的人才明白『沒有』」。難怪盧雲神父說我們應該向窮人學習。窮人更懂得幫助他

⁴⁸ *The Economist*, 『Wealth, poverty and compassion: The rich are different from you and me』, July 31st - August 6th 2010, p. 60

人及接受幫助；更懂得「一起經歷生命，包括無私互愛、真誠分享、實踐服事、犧牲的付出、同情安慰。」⁴⁹

⁴⁹溫偉耀(1991)，《無能者的大能--社會公義與屬靈操練》。香港：基督徒卓越使團，30 頁

3.4) 實踐性默想：更大的社企

企業 (enterprise) 原指一件複雜、冒險的志業。四十年前電視片集《星空奇遇》內的太空船叫企業號，但近年電影《星空奇遇》內的太空船則叫冒險號，其實英文船名一直沒有變。社企 (social enterprise) 不一定是一盤生意，也可以是尋求建立「好社會」 (Good society) 的一個宏大、艱難、冒險的企劃；這是「社會企劃」，在美國很多社企⁵⁰是這種著眼於以創新的方法解決社會問題而財政依靠捐獻的社會企劃。

3.4.1 社會關懷：城市轉化

在香港最大的這種社會企劃就是轉化這個城市。社企的出發點是一項社會關懷的議題，在社會分析性默想中指出香港的相對貧窮是富裕經濟地區中最差；草根階層面對的是生活上的相對貧窮，而中上層人士亦不一定快樂，心靈貧乏；在全球化洶湧而至的浪潮中，情況逐年惡化，施政報告一直未能跟上形勢，只有撲火救火，未能治本清源。香港政府處於被動，沒有一個強大的政府機器去獨力解決這個問題；而民間除了埋怨外，建設性的主意及原型 (prototype) 亦不多。

在全球快樂指數的調查⁵¹中，香港得 41.6 分，排名第 84 位，中國是 57.1 分，排名第 20 位，而第一位的哥斯達黎加得 76.1 分。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八日英國《金融時報》指出「財」富或收入超越某個水準後，便不能帶來更多快樂；又指出高收入人士多從事高壓活動；而低收入人士則多從事輕鬆活動如交友或休閒，前者比後者更少快樂。快樂不是來自財富而是來自有意義的活動。富足並不一定是擁有很多，而是想做的都可以做，能夠自我實現。而維克多·弗蘭克⁵²則解釋：「快樂不能直接尋獲，而是隨著從事有意義的活動而來。」有意義的人生，是讓別人開心，自己過癮。這是雙贏的分享。

⁵⁰ 社企有名的「Ashoka」，就是需要捐獻的社會企劃

⁵¹ New Economic Foundation (2009), *Happy Planet Index Report*, <http://www.happyplanetindex.org/learn/download-report.html>

⁵² Frankl, Viktor, *Man Search for Meaning*

基督信仰群體應參與這個城市轉化的運動，正如謝品然⁵³指出希伯來聖經的教訓：「主流核心的哲賢如以賽亞、或主流技匠尼希米，各自對國家民族的生存興衰有重大的影響力；邊緣位置上的阿摩司、和耶利米也同樣針對國族的處境和命運，提出了重要的批判與挑戰。」龔立人⁵⁴指出：「靈性不可能只有我與上主的關係，因為上主愛世界。因此，沒有伸延與其他人關係的靈性只是一種封閉，甚至自戀的靈性。…愛上主就是愛上主所愛。」而上主所愛的是世界，愛屋及烏，所以人要愛世界，愛上主所創造的人、生物及大地。「靈性不是要人逃離世界的不合理，而是帶著基督的生命進入世界，並挑戰它、改造它。」⁵⁵這是道成肉身。最能效法耶穌的，可能是在香港三百多間社企中的社會工作者，他們甘願被銅臭所玷污，下海營商，目的是弱勢社群帶來工作機會。

這個社會企劃的使命可說是：「藉基督信仰，以社企運動，助生活及心靈貧乏者，尋求另類的未來。」它不一定能改地換天轉化香港，但如能向前推動它這麼一點點，便已發出了先知的呼聲。

3.4.2 變更理論：「意義」經濟

社企的主要使命是創造社會價值，而這個創造過程所立足的是建基於分享文化的「意義」經濟。

「意義」經濟

社企是一種另類經濟。責任消費者到社企髮廊剪髮，一百元是付給服務，另外二十元是為了支持其社會使命，因為覺得幫人有意義。知識型義工付出專業知識及時間，換來的不是金錢而是自己的人生意義。社會投資者不落注藍籌股票而選社企，尋求的不是財務回報而是社是效益。商業機構與社企合作，著眼點是客户會因此覺得他們是良心企業。媒體報導社企故事，因為讀者和聽象觀眾希望知道更多好人好事。在這五類情況，「意義」是一個重要元素。

⁵³謝品然 (1997), 《衝突的詮釋》，香港：建道神學院, 155 頁

⁵⁴龔立仁 (2006), 《糾纏的靈性：社會、倫理與教會》。香港：香港基督徒學會，123 頁。

⁵⁵同上

張五常⁵⁶解釋：「市場是物品或服務交換的地方。」自願的交易含意著每個參與者都從中獲得想要的。交易之所以會帶來雙方利益是因為大家的邊際用值不同。他對科斯定律的「權利有清楚的界定是市場交易的先決條件。」闡釋為「任何人到市場購買任何物品，都期待著該物品有某程度的權利或好處，不一定很清楚，但總要有某程度的權利預期。… 這裡的問題重心，是權利毫無界定的物品或服務，不能在市場成交。」

經濟是指一種交易的體系，除傳統農業、工業、服務經濟外，九零年代後期星巴克咖啡店曾帶起一陣子「體驗」經濟(Experience Economy)，顧客所購買的是由進入店門開始所體驗的舒適休閒、咖啡的味香、店員的服務、及其他客人所共同營造的友善氣氛；產品就是「體驗」的過程。麥當勞與星巴克雖然同樣賣咖啡，但客人在星巴克是付出更多以購買其中不一樣的體驗。另外現時的「知識」經濟，是指產品是以內涵的知識元素去競爭的經濟。知識產品可以是高科技產品如 iPad、互聯網服務，或主要依賴資訊科技和通信技術的金融和貿易服務，或創意產品如設計和娛樂、或電影如「潛行兇間」等。若果知識經濟是指「知識」是產品中的重要元素，則「意義」可說是社企產品中的重要元素。社企是一種「意義」經濟，它為社會開發另類的價值及方向。

一件事的「意義」是一種主觀的判斷，社企越能夠清晰說明其追求的社會效益 (Social Impact)、所應用的變更理論、和所獲得的社會投資回報，將能用「意義」交換其他資源，發揮「意義」所帶來的優勢。這裡所指的「意義」，有兩個層次。表層是社企支持者覺得社企不是追求最大的利潤，而是著眼於建造更美好的社會，為大同努力；所以支持社企是有意義的活動，這是往外看。但往內看，反過來說社企是給予支持者所需要的人生意義。真正

⁵⁶ 張五常 (2010)，「市場概論」，*信報*，2010-10-19，15 頁

的快樂是來自意義，意義可以是來自分享。正如在詮釋性默想中指出一種全民參與的分享文化。

社企的「意義」經濟不是一種主流體系，而是一種另類經濟；它是在批判現時的重重霎時滿足感的消費主義，它指出人生可以有另類的選擇。社企運動的成敗取決於其在公共空間的競爭力，能否清晰解釋社企所引伸的意義經濟，從而發揮其五種獨特優勢，招聚相關的社會資源改善社企的質素、擴大市場的需求、提升個別社企的存活率、繼而吸引更多創業家開辦新社企以解決不同的社會問題。

3.4.3 成功關鍵: 在公共空間的競爭力

謝品然⁵⁷所倡議的公共神學提出建構力和對話力這兩個要素：

「基督教思想在現代社會分化的現象處境裡，要提升在開放空間中的競爭力，需要兩方面的醒覺。一方面我們必須對參與現存言論空間之種種遊戲規則與媒體資訊的應用有所瞭解與掌握… 另一方面必須提升基督信仰的思想內涵與創造力，好讓我們在現有的處境中擁有社會意義建構力與對話力，這是我們信仰內涵實質的表彰，需要紮實的而活潑的建構與對話內容，而兩者雙管齊下是必然的策略。」

社會意義建構力

尼布爾·利查⁵⁸提出「基督改造文化」(Christ the transformer of Culture)，今天的文化內涵主要是受商業文化所影響。基督信仰群體若是與上帝同工，則要思考如何批判及改造當下的商業文化。宣揚環保的綠色經濟、提倡社企的意義經濟、呼籲團結貧窮人的同在經濟 (Solidarity Economy)、及嘗試整合公營部門與公民社會的社會經濟 (Social Economy) 等，都是以不同的進路，尋求社會改變。而它們的起始點都是批判當下文化的某處缺憾，但沒有止於此，而是再而構思可能的出路。這是秉承舊約的先知傳統，不單要針砭時弊 (criticizing)，更要描繪出先知的盼望 (energizing)，引領百姓到走向另類未來的路途，這個未來不是根據過去和現在所投射出的未來，而是上帝所應許的未來。

社企運動帶來對未來的盼望。香港政府參照外國成功案例而推介的社企運動作為扶貧的其中一個方案，現時仍在起始階段，整個社企運動的路綫圖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起動期，主要的推動力來自政府三個基金⁵⁹的撥款，其中二零零六年開始的「夥伴倡自強」是政府正式為社企而創立的計劃。

⁵⁷謝品然 (1997), 《衝突的詮釋》，香港：建道神學院

⁵⁸尼布爾·利查(1992)，《基督與文化》，臺灣：東南亞神學院協會

⁵⁹ 伙伴倡自強基金、社區投資共享基金、携手扶弱基金

下一階段的成長期，關鍵元素是民間力量的加入，包括社企的營商知識、及責任消費所帶來的市場需求；但先決條件是社企所帶來的意義，和所涉及的分享文化能夠廣被宣揚。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三日，特首曾蔭權在其任內第五份施政報告⁶⁰提出：「香港目前已有三百多家社企。為凝聚社會各方力量，扶掖社企的發展，政府會開展〈社企之友〉運動，獎勵私人企業為社企提供各種援助，如資助、顧問服務及夥伴合作等。我們會推出社企訓練課程，培育年輕社會企業家。為加強市民對社企的關注和推廣良心消費，我們會舉辦〈社會企業展〉。」先是運用營商專才改善社企產品及管理的質素，然後大力推廣責任消費的市場，是提升個別社企的存活率的關鍵。

最後是成熟期。當存活的社企大增，便會吸引更多創業家開辦新社企，這時候社會創投基金、私人的慈善基金會、及個別的投資者便會湧現。為社企運動提供財政、社會網絡、及知識管理等資源。這個階段的催化劑是社企的社會投資回報的評估報告，以讓投資者揀選有潛質的項目；及慈善團體董事會及體制的更新，以接合社企有別於傳統社福服務的運作模式。

⁶⁰ 2010/11 施政報告。內容載於網址：<http://www.policyaddress.gov.hk/10-11/eng/p145.html>

言論空間對話力

對話力有點像崇拜講道，希望聽眾受到激勵而作出改變；但它更考功夫。首先，論述的進路需要更活潑而具有多重性格，能盡量同時照顧理性及感性的受眾；包括獨到而整全的理論或逆向洞見、簡單易記而深刻的符號或故事、具體的數字分析、及成功個案等；福音書中的耶穌是頭兩項對話的高手。其次，管道組合可以多樣化，包括組織學會、講座和會議、比賽或選舉、媒體曝光、學術論壇及研究發佈、著作出版等；規模在注重大眾時亦不忘小眾，既可以五千人也可以只是十二門徒。

最後，對象包括政、商、民、教、媒。其中，社企這個議題本身對媒體就有吸引力，只要言之有物，見解深刻，苦於題材缺乏的記者自會報導。其實，媒體就是公共言論空間的主要場地，在媒體的曝光亦成為通往其他政、商、民的切入點。而政府的決策官員，多有跨部門甚至跨界別的的經驗，但他們同樣渴求現時需要有跨學科的洞見的解決方案。最後，商業機構與商界專才是兩回事，前者行事是基於客觀的商業計算，後者因為個人主觀的人生哲學可能更容易投入。陳啟宗⁶¹認為，「公益事業不是企業（enterprises）的社會責任，而是企業家（entrepreneurs）的社會責任。」企業家應用賺回來的錢回饋社會，但社會不應對此要求過高，上市公司將資源投入公益事業時，亦應只做對企業發展有幫助的公益活動，捐獻規模也不能太大。

其實政、商、民、教、媒中都有基督徒，在不同的對話管道中不難遇見熱心的信徒。反而個別教會的教牧同工一般的生活圈子較狹窄，除部份關心香港弱勢群的傳道人外，很少教會會留意社企運動。故此，若果基督教媒體是發動對話的切入點，則神學院及大型教會是在教會界別引起關注的制高點。現時在公立大學中，已有數間開設了社企的課程；而美國的柏祺大學亦在香港舉辦以神學為基礎的社企碩士課程，而其他本地神學院則只有個別神學生以社企為題寫作論文。神學院的支援可以是介紹社企的概念、鼓勵老師及同學就社企與神學及釋經探討和發表論文，讓社企

⁶¹ 陳啟宗 (2010)，「陳啟宗：企業家的社會責任（二之一）」，*明報*，2010-10-21，A33 頁

的神學反省更紮實。下列都是有趣兼有用的題目：以道成肉身討論 從教會「跨越」到社企、以 解放神學 建構 社會轉化、藉 社企經驗 反省 神學實踐、以 公共神學 帶領 社企運動、以 耶穌運動 討論 另類的價值觀等。

教會可以有四個層次的投入，依次是瞭解、支持、傳播、及參與。瞭解主要是邀請講員分享；支持包括探訪參觀、鼓勵弟兄姊妹成為責任消費者或知識義工；傳播是將社企概念傳揚開去；參與可以是教會直接與社企合作、或自行經營社企。現時後者主要是天主教、聖公會及循道衛理會；而福音派大型教會中，播道會的幾個堂會和北角宣道會都舉辦過與社企有關的成人主日學課程。

最後，基督徒社會企業家群體等自身的實踐中反省、在信仰群體中的見證分享，將第一身回應呼召的經驗、及在弱勢社群中尋找耶穌、學習行出來的信仰等，都是感動人心的另類講章。《時代論壇》在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二日的社論指出：「基督宗教所展示的恩典與救贖，可以衍化為現實中的社會良知和心靈重建力量，教會和信徒需要身體力行去建構一種典範，才能為大眾所認受。一般人未必明白聖經的論述，但利他精神和無私奉獻，扶弱助貧和伸張公義，都是普世價值所重視的。惟有在這個基礎我們有所建設和影響，始能在社會政策的推行和改革上，傳透出一種忠於信仰，福於眾人的價值判斷來。」

跨界別的協作

文化有三個層面⁶²，底層是人的意識知識、思想價值、身份認同和生活方式。中層內裡結構與原理的總體結構及運作系統。表層才是生活現實中看見的人和事。上述是關乎底層的討論，下面是總體結構及運作系統的討論。

在全球化衍生的問題續漸顯露下，甚麼是「好社會」、及如何建立，漸漸成為熱門議題。美國的米高·愛德華茲⁶³提出第一部門的政府有權、第二部門的商界有能

⁶²洪青田 (2010), 「發掘香港文化創業產業礦藏」, *信報*, 2010-10-21, 22 頁

力、第三部門的公民社會有心；後者要改變社會，惟有透過在公共空間的言述影響市民，藉市民手中的選票影響政府的立法及施政、藉他們手中的鈔票影響商界如何履行他們的企業社會責任，最後是影響自身所處更鬆散的公民社會⁶⁴如慈善團體、教會、學界其他公共知識分子等如何建立好社會。

但正如在社會分析性默想中指出香港政府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不像美國政府般可動用不同的政、經、軍、文的手段，或中國的強大政府機器，而是處於被動的位置。在二零零七年十月十日，特首曾蔭權發表的第二份施政報告⁶⁵，在有關社企的部分，他提到：「在這個新時代，香港要建立新的關懷文化．．．我競選時提出大力發展社會企業，是要推動政府、民間、商界三方合作，大家拿出最大的誠意，推動社會企業及促進就業。」他提出的不是要香港政府做中間人強行重新分配財富，而是扮演協調者，鼓勵生活條件較好的人士去幫助弱勢社群；包括分享知識、技能，以及資源；目的是讓社會企業成為激發弱勢社群自力更生的平臺，而和諧社會亦有利營商，這是多贏的局面。曾蔭權指出解決貧窮問題的可能性(potentiality)是來自政商民三個部門⁶⁶的合作。要擴大社會影響，社企的資源與大企業可動用的財力物力及人力相差太遠，公民社會需要夥伴企業以提升社會效益。另一方面只有政府才可以監管大企業的參與，以確保其操作符合社會的整體利益亦保障少數弱勢社群的權利。

⁶³ Edwards, Michael (2009), *Civil Society(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⁶⁴ Kumar, Raj (2010), Social enterprise: It takes a network, *McKinsey Quarterly*

⁶⁵ 2007/08 施政報告。內容載於網址：<http://www.policyaddress.gov.hk/07-08/eng/p122.html> dated Oct 31

⁶⁶ Dan Viederman, Dan (2010), Teaching the world to change, *McKinsey Quarterly*,

4) 總結

為了要獲得成果，解放神學家必須要有參與的真實經驗，包括與受壓迫及邊緣化群體在一起，以及與其他幫助他們改變生命的人士共事；然後確立紮實、活潑、簡單易明的議題以建構社會意義、及在公共空間對話的內容。藉著跨學科的知識，透過社會分析性默想，面對的議題的因果關係可以在當下的社會政治經濟的制約環境下作系統性思考；另外，亦必須要有從釋經性默想而來的聖經導引和啟發；最後以工商管理的框架重新默想整個神學實踐，提高實際可行性，知其不可便改善之，不是尋求立言立行而是立出的最大效益。

信仰尋求社會改變

這裡是嘗試從建基於基督信仰，藉社企運動帶來的機遇，為香港的城市轉化提供另類選項。依次探討香港人生活及心靈上的貧乏、社企作為一種「意義」經濟、及社企運動在公共空間的論述。有別於系統神學，解放神學期望獲得的成果不是「信仰尋求瞭解」，亦不是「信仰尋求社會運動」，而是「信仰尋求社會改變」，將信仰正能量注入建構社會進程中。社會運動只是途徑，不是終點。終點應該是將受壓迫或邊緣化群體的情況改變過來，讓他們能在有尊嚴和公平的環境下生活。十年前，職場神學開始冒起，但它是以自我為中心，亦默認現行經濟的意識形態；直到金融海嘯之後，現行以民主資本主義為基礎的經濟系統及其背後思想才飽受批評。社會企業為資本主義的改革提供了一個以截然不同的價值系統為基礎的另類經濟雛形。

改變的基礎是分享文化

和修本聖經將「愛人如己」正名為「愛鄰如己」甚是恰當；「世人」是一個符號，看不見摸不到，透過納稅幫助窮人是很抽離的單向行動；鄰舍是我們看得見的人，能夠直接感受到他們身受的苦楚，過程中我們又可能從他們身上發現耶穌。社企正是提供別於稅收的分享財富機制。另外，「如己」二字很有意思，它指向利己利

人的方向。雙方主觀視為利之所在的事物，很多時並不一樣，這種不對稱的情況，為社企帶來創造雙贏的機會；這個雙贏局面是來自交換或交易活動，交易是最基本的經濟活動。

基督徒可以是推動社會改變的主力

教會投置閒散了很多「剩餘」的才幹、購買力及資產，社企運動可以釋放這些被埋沒的資源；擅於經營企業的基督徒可以指導一個社會企業如何達到自給自足的境界或是擴張事業；中產階級家庭可以較高的價錢購買優質的社企產品。這不單是教會幫助社企運動，而是社企運動成為其中一個平台讓基督徒回應上帝的呼召，參與上帝對世界的計劃，讓愛彰顯在人間。

在香港，豐盛不只為了幫助釋囚及戒毒康復者而努力，更為社會責任消費、知識型義工及社會風險投資等相關文化而奔波。以豐盛經驗為範例，向基督徒與非基督徒同時宣揚這種新文化，盼望為社會轉化修直道路。正如禰智偉的分享：「社會企業、社責型投資、社會責任消費、公平貿易這些嶄新的當代現象卻展示了一幅迥異的可能世界的圖像 ... 與上主同工、改變社會，那怕最後未竟全功，但至少我們開始願意改變自己的生活、敢於想像另類的未來。」⁶⁷

⁶⁷禰智偉, 『社會企業：富人的福音?』《教會智囊》2009/10

參考書目

- 1) Bevans, B. Stephen (2002), *Models of Contextual Theology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 New York: Orbis Books
- 2) Cobb, B. John (1993), *Becoming a Thinking Christian: If We Want Church Renewal, We Will Have to Renew Thinking in the Church*,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 3) Collins, Jim (2005), *Good to Great and the Social Sectors: Why Business Thinking is not the Answer*, Jim Collins
- 4) Edwards, Michael (2009), *Civil Society(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5) Frankl, E. Viktor (2006), *Man's Search For Meaning*, Boston: Beacon Press
- 6) Guitierrez, Gustavo (1971). *A Theology of Liberation: History, Politics, and Salvation*. Britain: SCM Press
- 7) Hampden-Turner, Charlies, and Trompenaars, Fons (2000), *Building Cross-Cultural Competence: How to Create Wealth from Conflicting Values*,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ocess
- 8) Mills, C. Wright (1959),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9) Nash, L. Laura (1994), *Believer in Business (Chinese translation in 1999)*, Hong Kong: Logo Publishers Ltd.
- 10) Pring, Richard (2000), *Philosophy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London: continuum
- 11) Scholz, Susanne (2003), *Biblical Studies Alternatively: An Introductory Reader*. New Jersey: Upper Saddle River
- 12) Stackhouse, L. Max; McCann, P. Dennis; Roels, J. Shirley *On Moral Business: Classical and Contemporary Resources for Ethics in Economic Life*. Michigan: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Liberation and Development』 by Gustavo Gutierrez, P.331-338
- 13) Stiglitz, E. Joseph (2003),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W. W. Norton & Company

- 14) Stone, W. Howard; and Duke, O. James (2007), *How to Think Theologically (Chinese Edition)*, Hong Kong: Logos Publisher.
- 15) *The Economist*, 『Wealth, poverty and compassion: The rich are different from you and me』, July 31st – August 6th 2010, p. 60
- 16) 尼布爾. 利查(1992), 《基督與文化》, 臺灣: 東南亞神學院協會
- 17) 亞洲電視 (2009), 社區人和事, 《豐盛髮廊》, 2009-07-31
- 18) 民政事務局 (2007), 《社會企業: 團結社會力量, 促進社業發展》, 香港: 民政事務局
- 19) 李耀全 (2009), 《教牧職事的召命: 神學、靈性、實踐》,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
- 20) 香港電臺 (2009), 鏗鏘集 《營商要有道》, 2009-3-16
<http://programme.rthk.hk/rthk/tv/programme.php?name=tv/hkcc&p=858&pid=58086&m=photo&e=88237&page=1#album>
- 21) 陸鴻基 (2009), 《心靈何價? 資本主義全球化下的教育與心靈: 基督宗教與中華文化傳統的回應》,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
- 22) 紀治興、楊建霞 (2010), 《社企營商二十式》, 香港: 民政事務局思網絡
- 23) 紀治興、鄭敏華 (2008), 《營商能耐可以改變社會》, 香港: 思網絡
- 24) 郭乃弘(1998), 《關社神學初探》。香港: 香港基督徒學會。
- 25) 郭鴻標及堵建偉(2002), 《新世紀的神學議程, 上冊》。香港: 香港基督徒學會
- 26) 郭鴻標及堵建偉(2002), 《新世紀的神學議程, 下冊》。香港: 香港基督徒學會
- 27) 華理克(2003), 《標竿人生》, 臺北: 道聲出版社
- 28) 溫偉耀(1991), 《無能者的大能-- 社會公義與屬靈操練》。香港: 基督徒卓越使團
- 29) 溫偉耀 (2009), 《生命的轉化與超拔: 我的基轉宗教漢語神學思考》,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 30) 楊牧谷 (2008), 《基本信仰與超凡生命(第七版)》, 香港: 明風出版社

- 31) 賴品超 (2000), 《開放與委身：田立克的神學與宗教對話》。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
- 32) 羅永生、龔立人主編 (2010), 《宗教右派》, 香港：香港基督徒學會
- 33) 謝品然 (1997), 《衝突的詮釋》, 香港：建道神學院
- 34) 謝品然 (2009), 《開放的文本：聖經學和公共神學關係的初探》, 香港：研道社有限公司
- 35) 謝家駒 (2007), 《新愚公移山：十個社會企業創業者的故事》, 香港：社企創業者論壇
- 36) 禰智偉, 《教會智囊》「社會企業：富人的福音?」, 2009/10
- 37) 盧龍光、鄭炳釗、張修齊(2007), 《聖經的人生：馮蔭坤博士七十壽辰慶賀文集》,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
- 38) 龔立仁 (1999), 《解放神學與香港困境》。香港：香港基督徒學會
- 39) 龔立仁 (2006), 《糾纏的靈性：社會、倫理與教會》。香港：香港基督徒學會

《環球華人宣教學期刊》第 28 期，2012 年 4 月。

(謝謝作者供稿!)